

淺談香港新界后海灣 淡水魚養殖業的歷史 及其社區發展

張展鴻
劉兆強

香
港
亞
太
研
究
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This paper was subsequently published as:

張展鴻、劉兆強。2006。「香港新界后海灣淡水魚養殖業的社會發展史」，《中國飲食文化》，第2卷，第2期，頁97-120。

淺談香港新界后海灣淡水魚養殖業
的歷史及其社區發展

張展鴻
劉兆強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作者簡介

張展鴻。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研究地區包括日本、香港和南中國；研究課題有影視人類學、旅遊人類學、文化遺產、飲食和文化認同；編輯的書籍有：*On the South China Track*（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 1998）、*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China*（White Lotus Press, 2001）和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RoutledgeCurzon Press, 2002）。

劉兆強。2001-2002年任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高級研究助理。主要工作是在內前海灣一帶展開一項有關當地淡水養殖漁民的問卷調查，以了解社會經濟架構的轉變及保護區的存在對他們的影響。2003-2005年任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社區主任。主要職責是將「善用資源」的概念應用於內前海灣一帶的漁塘及廣東省及福建省沿岸一帶的濕地，令生態管理和居民經濟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 張展鴻、劉兆強 2005

ISBN 962-441-160-3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淺談香港新界前海灣淡水魚養殖業 的歷史及其社區發展

「窮人可以養蝦脫貧！」一位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工作的政府官員興致勃勃地說。

不管是政府官員或是農民，也不論是在辦公室、鄉村會議，還是他們的家裡，人們議論紛紛，話題離不開如何發展養蝦業，脫貧致富。數據顯示，在一九九八年，水產養殖業——特別是草蝦養殖——賺取了越南全國第四大的外匯收入，今年總營業額更估計高達港幣八億五千多萬元。養殖一公斤的蝦，就等於種植五百公斤稻米。

大規模發展水產養殖業，最先受影響的竟是湄公河沿岸的紅樹林。紅樹林一直是湄公河河口生態很重要的一環，它為許多不同的生物如海洋生物、候鳥等，提供可循環的食物，讓牠們世代棲息、繁殖；也提供了大量漁產，養活比鄰的人民。除此之外，紅樹林也提供了寶貴的木材、薪柴、牲畜飼料、蜜糖、食物，和藥物。說它是沿岸居民的生活所依，實在不為過。……

為了養蝦，農民通常會砍伐紅樹林，騰出土地，挖掘池塘。在茶榮省和明海省，所有養蝦池塘的前身均為紅樹林。失去了紅樹林的保護和哺育，沿岸泥土受到季候風侵蝕，水土嚴重流失；加上漁民大量捕捉未成長的海洋生物，天然蝦苗的數目不斷下降，沿岸的漁產也大受影響。

洪雁（2000:3-4）

前言

生活在資訊全球化的今天，我們一方面要接受現代消費主義和高科技帶來的急劇改變，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存地方傳統

及歷史文化的固有特色。雖然兩者不存在著必然的對立關係，但要取得平衡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漁農業等基礎生產，它們不但未有在現代物質消費社會中受到重視，而且每天承受著城市化和工業化所帶來的挑戰；如何令它們適應現代科學生產模式和作為地方文化而得以保留，將會是二十一世紀其中一個不能忽視的社會文化課題。對於在新界西北部（后海灣一帶）從事淡水魚養殖的漁民來說，由於鄉村地區範圍近年不斷縮少，而新市鎮的規模迅速擴大，兩者在發展之間正存在著不協調甚至矛盾的關係，為淡水魚養殖業帶來前所未有的考驗。一方面，地區特色的鄉村傳統與新市鎮的現代生活之間所存在的文化價值觀差異，比過往更甚明顯；但另一方面，現代化的交通網絡，使習慣了都市生活的一群很容易便能接觸到那似被遺忘了的農村傳統，從而出現複雜和多樣的看法。

文化人類學家一向關注傳統文化和地方生產模式的互動關係，近年的研究更加在社會變遷的基礎上注意到傳統漁業的企業化（Brandtstädter, 2004），以及因養殖業的轉變而帶來的社會分化等問題（Jamieson, 2002）。雖然這些研究對養殖業變遷所引發的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提出新的觀察角度，但畢竟這方面的研究和探討還少，而每天出現的變化和課題卻多。例如洪雁（2000）在《樂施》的環境問題專輯中提到現在越南因為大規模發展水產養殖業而帶來生態危機，這仍有待專家學者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討。我們希望在這裏對香港新界的淡水魚養殖業所面對的問題和漁民在所經歷的社會變遷作概括的回顧和探討。

香港新界的后海灣、米埔濕地保育區及其周邊的商業魚塘，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問題是多樣性的。其中包括因香港、深圳一帶的基建發展而帶來的環境污染，社會發展和經濟轉型帶來的人口老化，以至因香港與內地貿易開放，內地廉價淡水魚類大量進口帶來的競爭，這些衝擊都引致傳統淡水魚

養殖業式微 (Lai and Lam, 1998, 1999)。雖然每一種行業都有興衰，但對於養魚業的式微，我們就特別注意到其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此外，淡水魚養殖業社區的發展除了反映出新界西北部社會的變化外，亦反映了整個香港社會文化的改變。對於位處香港與深圳邊界地區的淡水魚養殖業，我們並沒有很多文字記錄和有系統的深入研究，對它的發展過程也不大了解，更談不上對它的複雜性有所討論和剖析。基於以上原因，本文旨在探討作為傳統行業的淡水魚養殖業與元朗地區發展的關係，同時亦會探索后海灣漁業的歷史及發展，從而了解過去數十年香港淡水魚養殖業的興衰，以便為日後對香港社會文化和自然遺產的討論建立基礎。

香港淡水魚養殖業的發展

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的資料，在2004年，香港的水產養殖包括內陸塘魚養殖、海魚養殖及蠔隻養殖業的總生產量達3,700公噸，價值約12,000萬元，佔漁業總生產量的2.2%及總生產值的7.2%。以淡水魚養殖業為例，「塘魚養殖業集中在新界西北部。魚塘有淡水及半鹹淡水兩種。在2004年，本地內陸魚塘所佔面積約1026公頃，生產約1980公噸淡水魚，價值約3300萬元。這些魚塘中，約有96%是從事混養（即大頭、鰻魚、鯉魚及鮭魚連同福壽魚或烏頭類一併養殖），其餘的4%是單養肉食性魚類，例如淡水的生魚和盲鱮以及在沿海半鹹淡魚塘養殖的鮭魚和金鼓等。大多數魚苗及幼魚是從內地及台灣輸入。本地沿岸水域內，亦可捕獲一些烏頭魚苗。傳統上，魚苗會在初春放養，大部份飼養品種會在8至12個月內長至可售賣的體積。」 (<http://www.afcd.gov.hk/fisheries/chi/aquac.htm>)

相對於2001年的資料，當時的魚塘總面積約為1,059公頃，生產淡水魚2,550噸，約值4,500萬元，2004年明顯地有走下坡

的趨勢，單是生產總值也減少了1,200萬元之多。雖然漁農自然護理署為促使本地水產養殖業得以持續，向養魚戶提供多種新淡水魚如寶石魚（Jade Perch）、丁桂（Tench）及長吻鮠（Chinese Long Snout Catfish）養殖，以維持本地養殖業的競爭力，又與漁戶合作進行養殖試驗，以突顯新品種的市場潛質，但其成果也無法在短期內對淡水魚養殖業帶來明顯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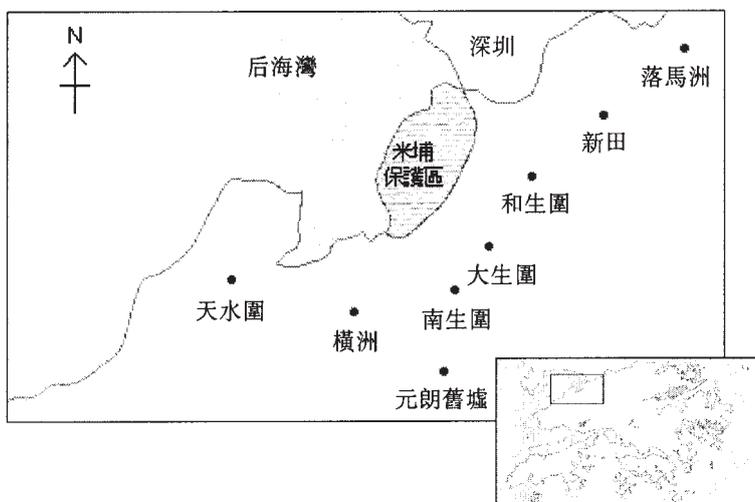
面對今日的困難和挑戰，我們不其然地問：香港在上一世紀的淡水魚養殖業究竟是怎樣的情況？淡水魚養殖業怎樣在新界發展起來？經營養魚業的是甚麼人？更重要的是，淡水魚養殖業對今時今日的香港社會有何重要性？后海灣的傳統淡水魚養殖業大概可以追溯至80年前，然而，對於這個行業的發展，以至在當地直接或間接從事這個行業的人，至今都沒有學者或專家作出過詳細的探討和記錄。正因這原因，我們在本文引用的數據及資料，大都來自與漁民進行的深入訪問，以及一部分在香港大學提交的論文。

進行實地考察和訪問的初期，我們就這個地區淡水漁業的起源問題訪問了一些年長的漁民；就他們所知，元朗一帶的魚塘原本是當地鄉村的風水塘，鄉村由同一個宗族的成員組成，因此，捕獲的魚類會分配給族內的成員食用，而不是作商業買賣或交換。而到了1920年代，新界的魚塘才開始變得商業化，尤其是元朗區的山貝村、橫洲、南生圍、南邊圍及西邊圍，可說是商業魚塘的先驅（參閱圖1）。

有關元朗商業魚塘和養殖業的歷史，馮志明（1996）在《元朗文物古蹟概覽》中也提到：

在二十年代，深灣一帶之村民在海邊築基壘，用以抗拒潮水，這些被基壘圍繞之範圍稱為「基圍」，亦是魚塘的前身。村民在「基圍」較深的地方設置水門，利用海水潮汐漲退來捕捉魚蝦，並且在較淺的地方種植水草，或在夏秋之間種一造鹹水稻。

圖1：香港新界后海灣地圖



三十年代，山貝村附近的鄉民開始建造魚塘，並利用雨水來沖淡塘中土壤所含之鹽份，使塘水適宜飼養各種魚類。後來，具有一定規模的魚塘如「大利」等紛紛出現。元朗因而成為新界養魚業之中心。

從前，元朗平原上的深灣岸邊一帶，廈村天水圍，新田落馬洲，十八鄉南生圍等地方，大小魚塘連綿數里，面積比水田還大。在陽光照射下，一片一片的魚塘像千百面明鏡，閃閃發光，平鋪山前。

元朗的魚業要算「烏頭鱈」最著名，「檸檬蒸烏頭」即新界名饌之一，頗負盛譽。烏頭鱈在河口和近岸地方產卵成魚苗時，漁戶將牠捕回，放在塘中與鯉魚同養，成長至約斤半的大小時，最為豐腴肥美。

二次大戰後初期，元朗的漁業相當吃香，是當地經濟的重要命脈，烏頭鱈的產量很多。而歐洲、美國的華僑又十分喜歡品嚐元朗土產的烏頭鱈，商人把經過特別加工的烏頭鱈入罐後運往海外銷售。

鄉民亦利用魚塘養鴨。一方面，鴨可以利用池塘作為其棲息之所；另一方面，養魚者就利用鴨糞作為養魚之飼料，或供應魚塘中微生物所需之肥料，使其大量繁殖供魚食用。

近年來，深圳、東莞、太平以及汕頭等地把魚獲運送來港傾銷，使本港養魚業收益減低。在南生圍和天水圍，許多魚塘已被填平或埋在鋼筋水泥之下。不少漁農已轉業謀生，紛紛遷出市區，仍然願意「耕塘」的多數是上了年紀的村民。（頁62-63）

儘管部分魚塘現時已不再養魚，但對於自1930年代開始發展起來的淡水魚養殖業來說，這些商業魚塘在當地也曾經扮演著重要角色。根據收集得來的資料，我們發現元朗山貝村的重要性不但在於氏族擁有一定數量的淡水魚塘，而且在大戰結束後，這裏從事養魚業的人士對養殖業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位於元朗舊墟南邊圍的魚塘，是錦田鄧氏的祖業（《華僑日報》，1958年9月20日），而租用人則是山貝村林氏。正如馮志明（1996:62）提到，山貝村可算是元朗養魚業的先驅。山貝村是一條單姓的原居民村，由林氏宗親擁有，鄰近元朗舊墟，周圍都是魚塘。加上林氏在元朗舊墟的經濟活動和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第一屆理事長林達榮先生對養魚業的推動及對其後的影響，山貝村林氏正是提供我們了解香港養魚業重要的一環。今天，我們到山貝村一帶會發現到仍然運作的魚塘數目很少。雖然留在村內居住的原居民也不多，但村內的林氏宗祠和一些設施還算保存良好。而且，我們更注意到宗祠內有一幅林達榮先生於1937年從廣州大學畢業學成回來的紀念照片安然掛在牆上。和一位本地歷史學家的交談中，使我們察覺到雖然錦田鄧氏是元朗墟市的地主，但操控經濟活動的可能是其他的地方勢力。加上，正如陳奕麟（1986）在早年提出的土地擁有權問題，使我們更懷疑到究竟山貝村林氏在元朗地方發展上擔當的角色。

根據我們對林氏後人的訪問，山貝村立村百多年而林氏的

祖籍可追溯至福建莆田，在到達山貝村之前，先後定居在廣東新會和今天深圳的赤尾。林氏在新界不但擁有土地和魚塘，而且也活躍於元朗地方上的其他經濟活動如米行的生意。於戰前畢業於廣州大學的林達榮先生不但在1950年代創立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而且1960年代及1970年代時曾多次方面加強香港與台灣在養魚業方面的傳統貿易關係。

除了山貝村之外，橫洲也是香港淡水魚養殖業的發源地之一，據我們所知，當時有一間名為大利的公司，老闆何先生雖然並非原居民，卻興建了許多魚塘，並開始了經營飼養淡水魚的業務。Suen (1955:4) 再次提及：「1930年大利公司花了超過12萬元興建了13個魚塘，總共佔地超過300畝，而當時在元朗最大的魚塘佔地62畝，也是屬於這間公司的。」13個魚塘中，一半位於橫洲，另一半位於錦田。

至於位於南生圍的魚塘，Yeung (1968:10) 表示：「魚場大約建於1927年，在未建成魚塘之前，這裏是一片濕地，泥土含鹽分太高，不適合種植大部分穀物或植物，沒有甚麼耕種價值。這塊地是屬於胡南生先生的，因此魚塘也命名為南生圍。後來魚塘轉讓了給一位姓傅的，一直至今。」

根據Lin (1940) 的文章，我們發現早期共有五大集團經營養魚業，「每個集團的魚塘總面積約為100至500畝（即20至100英畝）；全部均建於后海灣南面邊界近元朗街市較低的濕地範圍內。就像鹽田及稻田一樣，這些魚塘周圍都築有很高的堤壩，以防潮漲、風暴或暴雨時氾濫。」（頁165）Lin也表示：「元朗區內六個魚場所有魚塘的總面積約為1,300畝（即260英畝），其中300畝屬於大利魚場，500畝屬於Poon Yau魚場，100畝屬於Leng Sang魚場，200畝屬於Man Fong Cheng魚場。連同其他面積較細小的獨立魚塘計算，新界其餘魚塘的總面積達1,500至1,800畝。現時，只有Poon Yau魚場的其中30畝魚塘仍然續繼養魚，其餘的魚塘都已荒廢。」（頁169）根據Lin提供

的資料，在1940年，魚塘的總面積達2,800至3,100畝（即560至620英畝）。

香港的社會變遷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香港社會經歷了巨大的城市發展和經濟改變，而理所當然地移民問題也就不能忽視。戰後的香港曾經歷兩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分別發生在1945至1947年以及1949至1952年，香港的人口也由1945年的60萬增加到1955年的234萬。這些移民包括了日治時期離開香港而暫避到中國內地的香港居民，以及基於政治原因在1949年解放後離開中國內地的一群。對當時的香港社會來說，後者不單代表著一股強大的勞動力，其中更包括身懷現代工業技術、文化藝術創造力、貿易投資經驗，以至擁有雄厚資本財力的人才；這也可以說為香港的社會發展注下一支強心針。但另一方面，人口的急劇上升令社會資源在分配上出現種種求過於供的現象，特別在食物生產的模式上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

資料顯示，在1940年代前，魚塘的總面積約為100公頃，而海水魚塘的面積則相當細小；由1940年代開始，后海灣就成為飼養基圍蝦、烏頭、生魚及其他淡水魚的地方。數十年來，新界后海灣是香港食用淡水魚的主要來源地，直至1960年代後期，才有大生圍及和生圍等由水稻田改成的魚塘出現；有關這些魚塘，除了一些關於當地發展的零碎資料外，其餘的資料並不多。

有關香港魚塘的分類，Grant（1971:38）表示在一般情況下，魚塘可以分為五種，分別是：（一）淡水魚塘、（二）魚苗培育塘、（三）分隔河流得出來的塘、（四）鹹淡水塘，以及（五）基圍。第一和第二種魚塘是淡水塘；第四和第五種則是鹹水塘，有著海河交界的生態特色；至於第三種，則是由河

流兩旁的水稻田改建而成，例如在天水圍就有450公頃的面積是從河流分隔得出來的，在未改建成商業淡水魚魚塘之前，以種植水稻田為主，當然，現在我們就只見到一輪新市鎮的面貌。從訪問中更得知天水圍是沿著屏山河而建，而屏山河是當時通往屏山一帶的主要河流。正如Fung (1963:15) 指出：「在新界以至整個香港，就只有一個這樣的魚塘，而且是全香港最大的商業魚塘，就是位於屏山天水圍的聯德魚場。魚塘的建築，是在屏山河流入大海之前，把部分河流以木柵阻隔，造成魚塘。魚塘共有五個分隔處，所以養的魚不會輕易逃脫。這個從河流分隔出來的塘的水鹽分低，主要用作飼養鯉魚。」雖然天水圍是位於屏山，但並不屬屏山鄧氏所有，而是屬於趙秋田和趙心田兄弟，亦即聯德魚場的創辦人。

提到天水圍的發展，我們也不能不一提和生圍和大生圍的變化。今天，和生圍已發展成一個低密度的私人屋苑加州花園，同時亦保留了部分魚塘及一條鄉村。和生圍與天水圍相似，原本也是一大片水稻田，在1960年代改建為魚塘，由於種米的經濟回報未能令農民追上香港不斷上升的生活水平，於是改為養淡水魚，令他們得到較佳回報（《華僑日報》，1981年5月15日）。至於大生圍，部分在1970年代已發展為現時的錦鏞花園——一個低密度的私人屋苑。自1970年代起，魚塘就相繼售予發展商，發展商收購了這些魚塘，並不是想繼續發展養魚業，而是提出了各種可獲得較高經濟回報的發展建議，但早期大部分建議都被拒絕，因此，在未有任何發展計劃落實前，魚塘又會租予當地漁民（部分甚至是這些魚塘的前度擁有人），令養魚業在當地得以繼續經營。接著我們會探討一下這些從事養魚業人士的背景，從而進一步了解這個和淡水魚養殖業息息相關的「社區」及其在香港社會發展過程中擔當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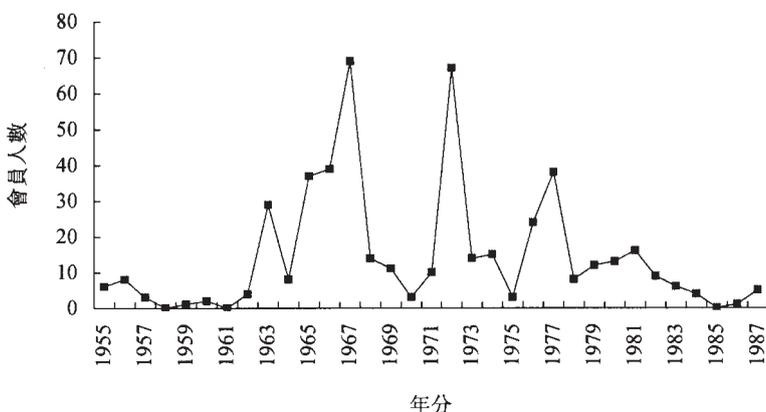
飼養淡水魚的漁民

有關新界淡水魚養殖業漁民的資料不多，我們在這裏主要根據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的檔案記錄，以及與資深漁民進行的深入訪問。此外，香港大學的有關論文也提供了有用的資料。正如我們之前所述，在1940年代之前，魚塘的面積都相對較小，直至第二次大戰後，魚塘才開始大規模發展，而魚塘的急速發展，亦反映出香港對淡水魚的需求不斷增加。戰後香港的人口增長促使養魚業不斷對日益增加的市場需求作出相應調整，例如在1954至1955年期間，中國內地禁止所有魚苗出口到香港，於是新界的魚塘就嘗試飼養非洲鯛代替鯉魚，這反映了漁業在經營上的靈活性 (Fung, 1963:78)。此外，Grant (1971:36) 更指出魚塘面積在其後十年間的變化：「在1958至1968年間，魚塘的面積由500英畝增加至2,000英畝。」因此，不難想像本地魚塘的增長是如何快速。

為了聯繫所有養魚業的人士，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在1955年成立，當時的辦事處位於元朗大馬路，後來遷至合益街和現在的阜財街。據說，其實在1955年之前，已有一個非正式的聯會成立，在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理事長黃（假名）先生的協助下，我們翻閱了1955至1987年期間登記的會員資料。登記表格經過整理及編排後，可以看到不同年分加入該會的漁民的分布狀況（見圖2）。對於在1967和1972年出現的入會高潮，我們訪問了黃先生以進一步了解其原因。

根據黃先生的解釋，由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是淡水魚養殖業的高峰期，所以相對地加入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的會員人數也有明顯增加。但香港社會的政治環境和協進會作為漁戶代表的功能變化，也可能使到會員數目在某些時段有明顯的上升，這方面的探討要留待日後的研究。此外，會員的籍貫

圖2：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的會員人數分布，1955-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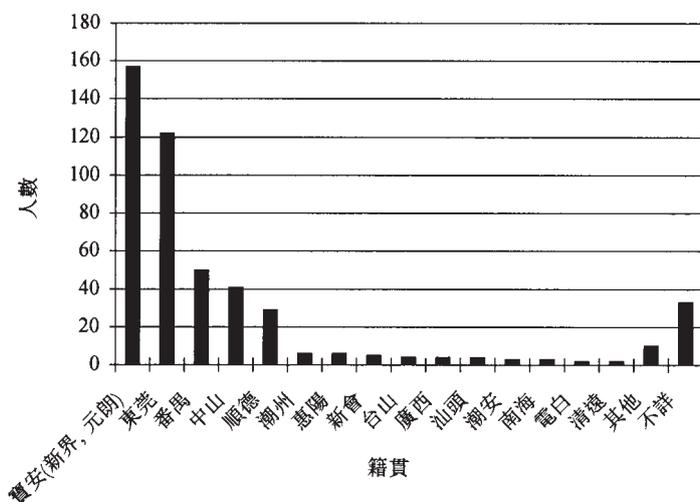


分布反映出大部分的漁民都是從珠江三角洲一帶到來的（見圖3），至於他們的詳細背景亦要留待日後的探討和分析。

在196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香港開始興起養金魚和熱帶魚熱潮，在新界西北一帶亦有一些魚塘或池塘飼養一些只具觀賞價值的金魚和熱帶魚如神仙、紅劍、彩雀和珠仔魚，而飼養這些觀賞魚的食物是蚊的幼蟲（俗稱紅蟲）。這些紅蟲的供應主要是來自元朗一帶的低原濕地如坑河、農田和魚塘內滋生的蚊幼蟲。根據一位在1960年代靠捕捉及清洗這些紅蟲（俗稱洗沙蟲）而維生的陳（假名）先生表示，當時入行從事洗沙蟲的人數有十多個，而捉紅蟲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當時元朗市中心的富隆正記腐竹廠後、大旗嶺、天水圍、屏山及牛潭尾等地方。

洗沙蟲這行業的主要工作是清洗紅蟲上的沙泥污垢後再賣予小販。工作過程是先預備一個袋口約2呎闊、6呎長的撈箕，然後把撈箕口向水面的沙泥或堆積物輕挖，而喜歡生活在這些堆積物的紅蟲亦一起被撈出。但由於打撈過程中，沙泥及堆積物亦一併撈入撈箕內，洗沙蟲的工作亦需把沙泥及堆積物

圖3：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的會員籍貫分布



篩走，通常最少清洗兩至三次才能初步把紅蟲暫時洗淨。此等紅蟲會被再放進另一桶內，當一天累積足夠數量後，工人便把所有捉來的紅蟲運回工場（通常是他們自己的住所），再放進另一盛水桶內，在桶頂鋪一層紗網，讓較為強壯的紅蟲浮游穿過此層薄紗，而集中在紗網上的紅蟲會被工人在第二天大清早時運往當時九廣鐵路的上水火車站路軌旁的金魚槽（金魚集散地）出售，而這些紅蟲除本銷外，亦會運往遠至歐洲各地。根據被訪者陳先生表示，當時一天單靠洗沙蟲可賺取到約20元。跟陳先生先前在工廠當學徒時的每月120元的入息相比，有天淵之別。直至1970年代，專門洗沙蟲謀生的工人達至300人。由於利潤豐厚，他們亦開始租借元朗新田一帶的水稻田或魚塘，利用雞糞大量培植紅蟲，以滿足日益增加的需求，洗沙蟲此行業經過十多年的風光後，本地紅蟲的價格由於受到從中國內地入

口的廉價紅蟲衝擊，以往靠洗沙蟲而維生的人開始轉行，洗沙蟲這行業於是式微。

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後期，除了洗沙蟲及在魚塘飼養雞鴨外，香港淡水漁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將魚苗大規模出口至台灣及東南亞等國家（Fung, 1963）。到了1970年代，雖然魚苗貿易已經走下坡，但本地對淡水魚的需求日增，本地的淡水魚養殖業於是成為一項重要行業，以供應本地內部需求為主。直至1980年代，養魚業仍是不斷的發展；魚塘的面積亦由1954年的186公頃，增加到1986年最高峰的2,130公頃（Cheung, 1999）。同時，我們發現直至1980年代，在本地淡水魚當中，烏頭約佔了40%至50%，是宴會及節慶活動席上經常食用的魚類。

翻查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的部分檔案，我們發現協進會在協助會員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為會員提供了各方面的服務，例如協進會為漁民簽發出口魚苗的許可證，協助有財政困難的漁民向政府及其他組織取得低息貸款，為漁民提供法律證明文件等。至於社區事務方面，協進會於1955年創辦了一個崇拜天后的組織，該組織自1950年代起就參與十八鄉天后誕的慶典。

養魚業人士在謀生計的同時，透過參與各種當地的社區活動，亦逐步融入社會。最近，部分養魚業人士放棄飼養淡水魚而改為飼養海水魚，部分漁民亦在魚塘引入了現代化的科學管理方式，以一條龍的服務代替了傳統的批發零售。透過建立自己的品牌，以及獲取公認的品質保證商標，養魚業人士或許可以獲取較佳的經濟回報，得以繼續經營。

現時香港淡水魚養殖業面臨的挑戰

在濕地發展的養魚業，在過去一個世紀一直不斷改變，因

此，必須以更詳細的方式重新研究養魚業與行內人士的關係。圖4展示了在1940年代前，魚類與養魚人的關係是既簡單又直接的。除了部分由家族擁有的魚塘，養魚只為供應家族成員食用外，商業魚塘養的魚亦只會滿足當地的需求，正如Lin (1940: 188) 指出：「元朗人認為烏頭是一種矜貴的魚，大部分當地魚塘生產的烏頭都是供應當地市場，除非市區的價錢遠高於元朗區，否則當地生產的烏頭很少會運到市區出售。其他魚塘的魚大部分也只是供應新界的需求。」然而，必須指出，魚苗的出口並不是第二次大戰後才開始發展的，Lin (1940:176) 表示：「元朗只有一個魚苗商，擁有大概十個魚塘，專門培育魚苗……，在1939年，五畝的魚塘只要一個半月的時間，就可以培育出一千萬條魚苗，當中許多都出口至爪哇、馬來西亞及泰國等。」

圖4：香港淡水魚養殖業的歷史發展

直至1940年代



1950年代至1970年代



1980年代至現在



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養魚業曾有不少重大的改變，包括在1950年引入了魚類拍賣系統，1955年香港新界養魚協進會成立，在過去20年內，淡水魚的需求隨著人口的增長不斷上升，一直發展至1970年代末將魚苗出口，在魚塘範圍養鴨等。Lai及Lam (1999:257) 更提出：「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隨著香港人口激增，對魚類的需求亦大增，促進了養魚業迅速發展。在這段養魚業的黃金期，本地出產的淡水魚，約供應本地需求的10%至16%左右。不過，由1985年起，養魚業開始走下坡，都市化令用作魚塘的土地減少、生產成本上升，以及中國內地的魚類大量進口，都威脅到本地養魚業的生存。自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無論是用作飼養淡水魚魚塘的面積，以至淡水魚的產量都不斷下跌。」

雖然魚苗出口、養鴨及洗沙蟲的業務走下坡，但養殖業的重要性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相反，自從保護米埔濕地的計劃開始後，養魚業在環境生態上擔當的角色起了很大的變化，帶來了另一種保育的意義。於香港西北部，位於深圳河河口的濕地保護區，正是國際知名的米埔及后海灣內灣拉姆薩爾濕地 (Ramsar Site)，一直以來都是候鳥南北遷移、往來澳洲與西伯利亞之間的中途棲息地。正如圖4指出，隨著早期簡單而直接的生產關係，1950年代至1970年代的養魚業成為香港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環；而1980年代以後的濕地保育和地方發展使社會人士對環保問題有所關注，加上過去數年間文化生態旅遊的普及，使養魚業展開新一輪的變化 (Irving and Morton, 1988; Chu, 1995)。但歸根究底，漁民的生計仍然取決於市場上的需求和賣魚的收益，所以漁民在不同情況如何作出相應變化，仍然是值得我們探討和了解的課題。

養魚場的魚類除了供應本地市場需求外，亦為棲息在濕地的候鳥提供了食物。到了今日，養魚業因為面對中國內地競爭、缺乏人手及經營成本高漲等不利因素而不斷萎縮，來自社會、經濟及環境的壓力，令我們面臨失去這些魚塘及米埔濕地

的緩衝區，而從環保而言，最重要的是，后海灣的魚塘除了供應本地人口對魚類的需求外，也是候鳥主要的糧食來源，對米埔及后海灣的生態環境有保護作用（Cheung, 2004）。

討論：二十一世紀香港的養魚業

然而，最近這片如此偏遠的地方成為發展住宅的目標，1999年12月，長江集團提出發展位於米埔濕地西南面的豐樂園，把其中5%的土地興建一個屋苑，屋苑內為樓高達25層的住宅，其餘95%土地則作為濕地保護區。這個建議引起了漁民與發展商之間的法律爭鬥，漁民拒絕為「重組」而遷出飼養烏頭的魚塘。現在訴訟已經完結，結果是魚塘可以繼續運作，此外，亦成立了一項基金，以補償為保護環境而損失的收入（Cheung, 2002），不過，濕地保育究竟會否被考慮作為可持續發展項目？至於后海灣的未來，我們仍想問：當這些年邁的養魚人士退休後，情況將會怎樣？誰會接手經營傳統的魚塘養魚業務，讓候鳥繼續前來棲息及在魚塘尋找食物？傳統的淡水魚塘能否繼續運作？豐樂園的藍圖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如果獲得環境保護署批准，雖然大部分地方仍會保留為濕地保育地區，並由管理公司負責管理，但漁民就要離開。我們看不到這片地方的長遠發展計劃，也不知道將來如何保育濕地環境，尤其是后海灣濕地緩衝區內佔地達1,500至2,000公頃的土地面積（包括運作中和非運作的魚塘）。在制訂未來保護這片大自然遺產的政策前，必須充分了解后海灣的社會歷史發展，而養魚業絕對能夠清楚反映香港近代社會有關濕地保育及環保的狀況。

參考書目

洪雁。2000。「在紅樹林養蝦」，《樂施》季刊，冬季，頁3-4。

- 陳奕麟。1986。「香港新界在二十世紀的土地革命」，《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61期，頁1-40。
- 馮志明。1996。《元朗文物古蹟概覽》。香港：元朗區議會。
- Brandstädter, Susanne. 2004. "Money Plucked from the Sky: Shrimp Farm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irculation of Know-how in a Fujian Village,"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1):41-67.
- Cheung, Chi-fai. 2002. "Nature Reserve Plan Unveiled for Wetland Sit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8 October.
- Cheung, Jacthey Yuet-ming. 1999. "The Socio-economics of Pond-fish Farm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Future Land Use in and around Mai Po and Inner Deep Bay Ramsar Site." Unpublished M.Sc. thesis,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Peter Wah-tai. 1962. "Records of Fieldworks to Un Long Shap Pat Heung." Undergraduate essa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heung, Sidney C. H. 2004. "Keeping the Wetland Wet: How to Integrate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56(3):29-37.
- Chu, Wing-hing. 1995. "Fish Ponds in the Ecology of the Inner Deep Bay Wetlands of Hong Kong," *As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3(1):13-36.
- Fung, Emily Wai-yung. 1963. "Pond Fish Culture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Unpublished BA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Grant, C. J. 1971. "Fish Farming in Hong Kong," in Denis John Dwyer (ed.), *The Changing Face of Hong Kong*. Hong Kong: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pp. 36-46.
- Irving, Richard and Brian Morton. 1988. *A Geography of the Mai Po Marshes*. Hong Kong: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Hong Kong.
- Jamieson, Mark. 2002. "Ownership of Sea-shrimp Production and Perceptions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a Nicaraguan Miskitu Village," *Ethnology*, 41(3):281-98.
- Lai, Lawrence and Ken Lam. 1998. "Pond Culture of Snakehead in

- Hong Kong: A Case Study of an Economic Solution to Common Resources,” *Aquaculture International*, 6(1):67-75.
- Lai, L. W. C. and K. K. H. Lam. 1999. “The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Pond and Marine Fish Culture in Hong Kong,” *Aquaculture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3):254-66.
- Lam, Ken Kwok-hung. 199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roperty Rights: A Case Study of Pond Fish Culture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in, S. Y. 1940. “Fish Culture in Ponds in the New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Fisheries Research Station*, 1:161-93.
- Suen, Chi-shing. 1955. “Fish Ponds in Un Long.” Undergraduate essa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Geolog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Yeung, Winifred Wing-han. 1968. “Pond-fish Culture in Brackish Water Ponds of Deep Bay Area with Nam Shan Wai as an Example.” Unpublished BA thesis,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淺談香港新界后海灣淡水魚養殖業 的歷史及其社區發展

摘要

本文從觀察新界后海灣一帶的商業魚塘，進一步了解香港濕地保育及社區發展的問題，其中包括香港、深圳一帶基建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社會發展和經濟轉型帶來的人口老化，以至因香港與內地貿易開放，內地廉價淡水魚類大量進口帶來的競爭，這些衝擊都引致香港的傳統淡水魚養殖業式微。有關的發展除了反映新界西北部社會的重大變化外，亦反映了整個香港社會文化的改變。基於以上原因，本文探討淡水魚養殖業作為一項傳統行業與元朗地區發展的關係，以及后海灣漁業的歷史，為日後對香港社會文化和自然遺產的討論建立基礎。

A Brief Account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Freshwater Fish in Inner Deep Bay,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Sidney C. H. Cheung
Tobi S. K. La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im to examine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in the cultivation of freshwater fishponds not only as a traditional occupation but also as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 Deep Bay area in the New Territories. We also examine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the fishing community in the northwestern part of Yuen Long, especiall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industry in Hong Kong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tend the investigation to the local community'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overnment, developers, and environmentalists in a cultural-political context; and, for future research, identify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Yeung Yue-man, PhD(*Chic.*),
Research Professor

Associate Director: Sung Yun-wing, PhD(*Min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